

# 中国传统村落:历史记忆与传承发展

## ——首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论坛会议综述

刘馨秋 沈志忠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4-0137-07

2017年5月20-21日,首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及南京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中国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协办;并由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釜山大学、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及南京农业大学等60多家研究机构的150余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会议。

5月20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主持开幕式。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张九汉、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周塞峰、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魏琦、中国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会长曹山明等出席开幕仪式。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张九汉、魏琦发表讲话。

本次论坛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为主题,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建筑与规划学的视角,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剖析和探讨,并借鉴国外传统村落保护的经验和启示,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提供启示。

根据会议议题设置,讨论内容分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三个方面。

### 一、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灵魂,而村落则是传统农耕文化的载体。对传统村落资源进行挖掘、记录和梳理,既是留存村落记忆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展研究、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基础。因此,“传统村落文化记忆”这一议题愈发受到学界关注,也是本次会议中专家学者的讨论重点。

#### (一)村落的形成与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潘劲在《村庄调研工作与体会》中,以北京远郊的红林村为研究

【收稿日期】2017-05-2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6SHC002);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6SJD770002)

【作者简介】刘馨秋(1982-),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沈志忠(1968-),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考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对象,从宏观角度围绕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演变这一主线进行调研,从而达到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的映射。

长江师范学院王希辉在《散杂居蒙古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湖北鹤峰三家台村个案调查》中,以位于湖北省鹤峰县西北部的三家台蒙古族为调查对象,从生计方式转型的视角分析和探讨了散杂居民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问题。他认为,三家台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经历了从宗族治理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从草原游牧到山地农耕的经济生活转换以及日常生活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转型与变迁。这种文化模式的变迁与适应,则是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多民族互动与长期混杂居住、历代中央政府政策引导、民族社会自身发展以及民族优秀文化智力支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赵越云同样关注生计方式转变对村落变迁的影响,在《传统与现代:一个普米族村落的百年生计变迁史》中,分析了普米族村落在集体化前后生计模式的演变,认为传统与现代生计模式之间既存在继承关系,同时又相互割裂,因此恰当处理继承优良传统与发挥现代优势的关系是未来农村何处去的基本走向。

防御性是中国传统村落规划和建设中的重要考量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是学术关注的一个热点。皖西学院关传友在《皖西地区围庄村落的历史考察》中,通过对方志资料的挖掘与梳理,确定皖西现存的防御性围庄村落起源于南宋,清咸同年间达到鼎盛,其形成和发展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遵从风水理论的原则以及宗族力量参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安庆师范大学王世红也以防御性村落为研究对象,在其《论皖南圩区的防御性聚落特质》论文中,对皖南圩区防御性聚落形成的原因、对外和对内的防御举措以及防御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安徽财经大学周路在《黄河沿岸古村落研究——烽火台与古山寨》中,以烽火台与古山寨为切入点,探讨黄河沿岸村民们自发以家族和宗族为核心,在几近垂直的悬崖峭壁上开凿隐蔽山寨,以此躲避战乱,御防寇匪。

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潘慧生在《走西口与滹沱河上游商人村落形成——以忻州东南宋村为例》中,以东南宋村为调查对象,分析了清康熙年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滹沱河上游民众走口外与滹沱河上游商人村落形成的关系,认为因贫穷而走口外,走口外而经商,因经商而富裕,富裕而大兴土木、筑宅建院,是滹沱河上游地区诸多商人村落的共同规律。

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秦莹关注少数民族村落的建筑布局,在《阿昌族传统村落建筑布局实考》中,对“树洞里面藏身,大树枝桠当床”的阿昌族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将阿昌族的建筑按其功能划分为提供家庭生活起居用的民居和水井、供奉神灵的宗教信仰建筑、进出村寨的寨门、象征村寨中心的寨心、供村民行走的路桥等,并对各类建筑进行详细记录。

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郭建军重点研究晋北宏道镇的空间布局,他在《清末以来晋北宏道镇空间布局变迁》中,以 1946 年底宏道镇被解放为界限,将清末以来晋北宏道镇空间布局分为两大阶段,并从地形地势、宗族关系、宗教信仰、政治活动、社会运动、经济行为等方面分析原因。

## (二)文化遗产中的村落记忆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天生在《人类非遗中国宣纸发源地泾县小岭村落保护研究》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的起源与发展为线索,对宣纸发源地小岭村的历史变迁进行细致梳理,并详细记录了小岭村的历史文化遗存。

广西师范大学产业经济与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所乔柏认为,历史文化村落的存在价值主要来自历史遗存及其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文化,他在《中国传统古村落深层次精神文化挖掘——基于历史文化名村萝村古壁画的整理研究》中,对广西萝村现存的 1033.85 平方米古壁画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了壁

画所表达的精神文化内涵。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沈琳在《吴组缃的泾县古村落文化记忆》中,通过对现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创作的涉及泾县古村落的文学作品进行解析,梳理泾县古村落文化记忆,包括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事象等。

民俗具有丰厚的地域历史内涵与地域文化特色,涉及工艺史、农业史、城市史、文学史、生活方式史、宗教史等诸多方面,是传统村落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也是村落研究的热点之一。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杨祺在《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流水席的重新建构及原因初探——以湖南连山大坪村为例》中,介绍了流水席的由来及其南北概念上的差异,并通过大坪村流水席模式及其变化,反思流水席城市化背后的乡村问题,认为流水席是一种村落文化和情怀,需要受到关注和保护。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卢勇、陈园园从少数民族婚俗着手,在《瑶族与壮族婚俗文化比较研究——以广西龙脊少数民族村寨为例》中,通过调研广西龙脊少数民族村寨,详细记录瑶族与壮族的婚俗礼仪,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立法共存与价值观统一是瑶族与壮族婚俗文化的共性。

民间观念与信仰是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旭在《中原村落祭祀中火神造型的分异与荧惑信仰发微》中,通过研究道口、焦作部分村落保存的火神造型来源,探讨荧惑这一火神信仰的具体组成对火神造型的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民间的火神形象并非某个单一与火相关的神灵,而是包含有荧惑、火德星君、祝融、阏伯、罗宣等等多重形象在内的笼统神灵。

### (三)传统村落中的历史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涛在《历史记忆与社会变革语境中的江南乡村——以唐代后期苏州甫里为例》中,从分析历史记忆与社会变革语境中的唐代江南经济入手,考察苏州甫里乡村经济的发展实态,进而对历史记忆与社会变革语境中的唐代江南经济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认为江南经济或东南经济成为国家财赋重心是以重赋来实现的,这样可能造成对唐代江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过高估计。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尹北直在《中国古代乡村文化记忆中的园篱伦理美》中,通过探讨乡村农户中普遍存在的“园篱”这一分隔、围合景观要素的制作技术和实用功能,分析“园篱”所承载的道德情操与审美意象,认为园篱所寄寓的亲近自然、诗意栖居的逸趣,勤勉务实的持家美德及柔而不犯的君子气度,体现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精神特质。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包艳杰、张浩认为,唐宋时期中原的人居环境相对稳定,乡野景观高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要素,达到了中国古代理想的景观状态,在《唐宋时期中原乡野景观的构成与表达》中,通过水土环境、土壤环境感知、景观等线索,复原唐宋时期的中原乡野景观,对乡村建设、景观设计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一种独特的村落记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任在《传统村落视域下耕读文化发展初探——以黄陂大余湾为中心的考察》中,对植根于传统村落中的“耕读文化”进行了细致阐述,他认为耕读文化主要产生于乡村,由乡村里的知识分子代代传承,村落和其中的读书人是耕读文化的载体。

南通大学文学院姜建、马万明将农史研究与传统村落研究相结合,在《清末民初大农业生产尝试与传统村落的变迁——以江苏南通为例》中,将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农业观引入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探讨大农业生产方式对促进农村地区社会面貌改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在当今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张謇的农业发展理念和措施对于理清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农村与城镇的关系,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自然衔接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和经验参考意义。

## 二、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一)多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曹山明在《熟人社会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天、地、心三者互生共存,在城镇周边的乡村恢复熟人社会形态是一种最佳的途径。他认为,应该用传统村落文化,建设现代熟人社会。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室龙文军在《历史文化村庄的价值与保护研究》中,通过梳理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基本情况,总结了传统村落原真性退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居民保护观念淡薄;第二,自我管理和保护能力差;第三,政府投入保护资金有限;第四,传统文化继承人缺乏,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建议。

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杨立国在《传统村落保护度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中,运用理论分析、目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原真度、活态度、完整度、价值度四个方面的24个指标,构建了传统村落保护度评价指标体系和传统村落保护度综合评价函数。他还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初步证明了该评价体系的实用性和计算函数的可行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在《传统村落保护机制初探》中,从对传统村落的认识变化、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保护过程中的困难、行动中涉及的相关利益方、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路径以及保护体系等六个方面进行探讨。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郭鹏宇在《形态类型学在村落更新和保护中的方法论意义》中,从根植于村落日常生活的集群建筑类型切入,用上庄村形态类型演变解释形态学理论,澄清集群类型在村落形态结构演变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物质形态的变异也是乡村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因此村落更新应纳入整体形态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提出在村落保护具体的划区操作过程中,以集群类型所确定的形态时期片区可以作为村落保护的单元,不同单元采取不同保护措施。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沈费伟、范虹珏、肖泽干在《多元参与视角下民俗传承与乡村复兴——以湖州市荻港村为例》中,对东部发达地区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研究,以多元参与理论探析荻港村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乡村复兴之间的关系。认为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复兴需要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具体包括政府政策扶持与资金供给、乡村精英挖掘与整理、社会组织弘扬民俗文化、普通民众本土文化的自觉以及市场旅游业促进民俗文化得到充分展示等。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吴昊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晓丽合著的《文化产业视阈下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例》中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个案,基于村寨的民族文化资源,从发展方式和人文关怀两方面探索民族文化资源运用于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以期对武陵民族地区乃至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并且尝试探索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南京农业大学詹国辉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研究——基于江苏S县的调研数据》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理顺了传统村落共生性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有效辨识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基于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理论,搭建出传统村落共生发展系统,厘清了其共生格局及其具体形态。他还借助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构出传统村落的共生度模型,进而基于江苏省S县的调研数据,测度出5个典型村落的共生度。他认为,通过提高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完善共生界面,

促成共生新增能量的产生等路径,可以实现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

铜陵学院思政部崔磊的研究关注如何让乡村精英来回归来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的建构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他在《乡村文化精英与传统村落文化记忆建构》论文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陈述:乡村文化精英与传统村落文化记忆建构的可行性、面对的困境以及两者间的协调性。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王佳星在《用文化元素丰富美丽乡村内涵》中,以浙江省平湖市鱼圻塘村为例,认为在鱼圻塘村建设美丽乡村的实践中,可以从打造宜居乡村、挖掘历史遗产、扶植当代乡风、培育文化生活四个方面入手,并总结实践中获得的启示:(1)合理规划,找准亮点;(2)发扬传统,形成特色;(3)转换视角,激发认同。

## (二)国际经验借鉴

传统村落保护是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下的命题,国外的工业革命早于我国,因此传统村落保护的历史比我国长久,有关的历史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学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建军在《英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观念和主要机制》中,介绍了英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观念,并总结了英国传统村落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他认为,良好的传统村落保护管理取决于相关的政策和保护行动对传统村落存在的“普遍价值的理解”,有关乡村景观和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共识是传统村落保护成功的关键所在,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同行动,是传统村落保护观念和远景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韩国釜山大学历史系崔德卿介绍了韩国传统民俗保护的工作经验,在《韩国传统民俗 maeul 的保护原则与实践》中,总结了韩国民俗村落的价值和保存方向,他认为 19 世纪 70-80 年代以后,韩国政府主导复原民俗文化体验,政府与居民之间产生了矛盾,而通过创造条件让居民自治、开展符合条件的收益事业,可以使民俗村落持续健康地恢复。

美国乔治亚南方大学林茂在《乌镇模式在美国:浅析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与中国外交软实力》中,重点研究乌镇的发展模式,探讨乌镇从传统“鱼米之乡”到当代“智慧小镇”的嬗变,并揭示了乌镇的国内印象与国际印象之间的差异。

## 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传统村落保护同样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保护对策以及探索适合的利用模式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王景新在《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持续发展》中,通过对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深入调查,提出了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一,拓展历史建筑修缮保护的时限和范围,传统村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遗产,其保护与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应该尽早谋划;第二,梳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村域发展、尊重传统与追求现代化、记住乡愁与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关系,界定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政策边界,确立保护与利用的优先序,用正确的理念、政策和规划指导实践;第三,科学规划历史文化村落产业发展,农、林、渔、牧、商、服务、休闲、教育等多种行业协同规划,实现多元化可持续发展。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施由明在《江西古村落的现状与保护开发述论》中,通过对江西古村落的形成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进行深入挖掘,提出古村落形成的历史原因包括中原移民南下建立起以平民宗族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状态与宗族大姓不断开基建村,并从中发现江西古村落具有文物、精神、历史、文化等价值,由此提出了具体保护的必要性措施。

西藏民族大学周毓华、邹莹、陈国贇在《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以贵州

省为例》中,总结了贵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面临的交通受阻、当地村民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安全隐患随时存在、村落基础设施普遍落后等难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发展思路与解决对策:(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让传统村落保护意识深入人心;(2)加大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投入力度;(3)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机制;(4)发展乡村旅游,为传统村落注入新鲜血液;(5)建立乡村生态博物馆;(6)处理好传统村落中的“人”的关系。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陈艳丽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对策研究——以河北涉县为例》中指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她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从几个方面入手:(1)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引导社会力量的有效介入;(2)尊重村民自治,尊重原住民的知情权,参与经营权等;(3)增加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有效改善人居环境;(4)发展村落经济,切实增强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融合时代的创造力,让古村落的发展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渔业村落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类型之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张静宜关注传统渔村的保护,在《传统渔村的文化保护与开发》中总结了渔村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保护性开发的对策。她认为,当前支撑传统渔村的海洋渔业日渐收缩,资源日渐枯竭,大批渔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导致人口密度本来就偏小的渔村空心化问题愈发严重。鉴于此,提出应该保留渔村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引入现代化产业运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渔家乐等休闲渔业旅游项目,以政府参与、社会化运作、渔民共建共享的方式进行传统渔村的保护性开发。

四川旅游学院川菜研究发展中心王胜鹏在《四川客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初探——以成都洛带镇老街社区为例》中,重点探讨了洛带客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他认为,通过深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满足当前洛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满足当地发展内生动力的需要,而且还能更好地传承这种客家精神;科学规划与管理不能仅限于在洛带客家古镇,而是应把东山地区客家文化作为整体进行保护和开发;每一个村民个体才是文化保护的单元,应调动当地客家人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积极性;不能把旅游作为传统村落的唯一出路,而是要正确处理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等商业行为的关系。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伽红凯从分享经济的研究视角探讨传统村落利用的机遇与挑战,他在《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利用与保障措施研究》中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利用方式,包括分享产业、分享文化、分享社区、分享旅游、分享生态。他还提出了传统村落利用的保障机制,包括政策、利益、人力、资金、产业等方面。

南京师范大学朱晓华在《城乡廊道理论视角下探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对策》中提出,因集镇体系的经济流动而产生的公共性场域,包括城乡间市集体系、城乡间神圣公共领域、城乡间流动人口、城乡间道路空间、城乡间同步协调的传统节日、民俗传承的符号载体六个方面。她认为我国古村落出现危机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因此应通过宗教、农事、餐饮、民宿、节庆等媒介修复城乡廊道生态系统,并通过城乡廊道生态系统的修复来构建传统村落的生态圈。

两岸协创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吴巍巍、陈县樑在《城市化进程中福州城郊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以乌龙江北岸为中心》中,以近年来福建省涉台文物普查和研究为契机,深入调查福州地区闽江下游若干代表性乡镇的传统村落,挖掘其中蕴含的现实价值。通过对传统村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及文化景观情境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应当以“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为基本理念,做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和维护工作,同时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使之成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名片。

传统民居以及古街巷弄构成了村落的骨骼,是村落得以成型的支撑,也是衡量一个村落是否传统

的重要指标。四川大学政治学院邓曦泽认为,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建筑总体上是缺失的。统一的基本规划之缺失,导致了无序状态,导致了资源浪费、建筑群体艺术美的缺失、建筑民族性与历史感的流失。鉴于此,他在《历史的安居——中国传统建筑复兴的可能性》中,提出了传统建筑的复兴思路:将传统建筑材料与现代建筑材料相结合,以传统建筑风格为主要风格。他还认为,在选择传统建筑复兴的样本时,首先应选择那些以实用功能为主的具有普适性的样本,其次才是其他满足特殊需求的样本。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房子恒在《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村落发展探讨——基于绍兴市冢斜村的调研》中,提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123”路径,即“1”个中心,以“整体保护、有机发展”的理念为中心;“2”个参与,包括社会资本参与和社区参与;“3”个不变,指在发展过程中做到古村落原生态的山水格局不变,古村落的田园乡村风情不变,古村落古朴沧桑的历史感不变。

凯里学院吴平重点关注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过度“整容”的问题。他在《自然本真是传统村落的最高颜值——从村落“整容”谈黔东南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提出,失真的“整容”正在对传统村落造成破坏。他认为传统村落“整容”应该遵从少一事、慢一步的原则,即在人力财力智力都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应分清缓急、突出重点、精准投入。

我们不得不承认,工业与城市发展、经济与社会转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面、大规模地保护或原封不动地留存传统村落是不现实的,村落的急剧消失还将持续下去。为了尽可能完整的记录当前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阶段尚存的、以及即将消失的传统村落文化,为了以后的研究者想要了解这一时期中国乡村形态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些素材,博物馆是一种有效的载体。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蒲娇、姚佳昌认为,建立传统村落露天博物馆模式是针对空巢村、拆迁村、残缺村等窘状的一种全新保护方式。通过活态文化空间的还原,让分散而珍贵的历史细节得到妥善的保护与安置,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多种理念与探索的可能性。在《传统村落露天博物馆的模式探索及原则分析》论文中,提出了三种传统村落露天博物馆的样式:(1)原地修建:为空巢村及留守村所建立的传统村落遗址式露天博物馆;(2)易地保护:拆迁村所建立的村落浓缩露天博物馆;(3)就地保护:对于新村旧村混杂的传统村落所建立的旧村博物馆。她认为,传统村落露天博物馆的最终目的是要留住传统村落的根脉及剥落的碎片,提供一处欣赏传统、认知历史、传承文脉的场所,唤起民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让原住民有景可赏、有家可回、有根可寻、有乡可愁。

首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学者们围绕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等不同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交流,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和对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是当代的现实责任与未来希望,兼具历史、科学和人文的物质与非物质的综合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人们越发认识到传统村落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希冀通过种种努力去保护传统村落,从中追寻中华文化的精髓,从而能更好的保护传统文化。我们肩负着传承与保护中国传统村落的历史使命,拥有着创造现代和谐生活的共同愿景,共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而戮力同心。